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法〕让-皮埃尔·阿泽马 米歇尔·维诺克 合著



商务印书馆

中译本前言

一部颇具特色的译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对我国广大的世界史工作者以及史学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史学家让-皮埃尔·阿泽马和米歇尔·维诺克合著的一部代表作。两人都生于 1937 年,又是中学、大学的同窗,在巴黎大学毕业后,阿泽马任职于著名的巴黎政治科学研究院,现为该院副教授。维诺克则到巴黎第八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兼巴黎出版的畅销刊物《历史》(月刊)杂志主编,现任该杂志编委及顾问。两位学者均专攻法国近现代史,合著过《巴黎公社社员》一书。此外,阿泽马和维诺克还分别著有《从慕尼黑到解放(1938—1944)》、《走向死亡的共和国》等著作。两人可谓法国较年轻一代的著名学者。

值得一提的是,阿泽马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 1956 年他就作为法国大学生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过我国,当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对这一难忘的时刻他至今记忆犹新。译者郑德弟在巴黎拜访他时,他曾对新中国赞不绝口,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来华,既作学术交流又可一睹中国社会主义的新貌。我们相信,阿泽马先生的这一愿望是一定能实现的。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版于 1970 年,系卡尔曼—列维出版社组织的《诞生与灭亡》丛书之一。当时两位作者年仅 33 岁,该书出版后即引起法国史学界的重视,短时间内在报刊上发表多篇书评,给予很高的评价。1976 年本书再版时,又一次受到法国同行与国

际史学界的重视。当我第一次读到该书法文版时，就被作者独到的分析和新颖的观点所吸引。后来，我受译者委托再次系统审读全部译稿时，更感到这是一部既有较高学术价值又富有强烈现实感的创新之作，将她介绍给我国读者是很有意义的，也必将受到我国史学界的重视和欢迎。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历时 70 年之久，是法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共和国。众所周知，它在法国近现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方面，都有重大成就，是法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而两次世界大战又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其军事上的胜败得失，也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唯其如此，法国史学界才一贯重视对第三共和国史的研究，已有多种专著出版，引人注目的有：泽瓦埃斯(A. Zévaès)的《第三共和国史》、夏斯特纳(J. Chasteret)的多卷本《第三共和国史》和米盖尔(P. Miquel)的新作《第三共和国史》等等。

然而阿泽马和维诺克的这部著作却独树一帜，它以重点突出、分析透彻见长，既不是全面系统的断代通史，又不是平铺直叙的史实罗列，而是紧紧扣住第三共和国诞生与灭亡的原因，进行多角度的深层分析，对共和国的成败原因提出了一系列的创见，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诞生”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二帝国的灭亡和第三共和国的诞生是必然的吗？长期以来，一般学者总是以第二帝国崩溃的必然性来解释第三共和国诞生的必然性。本书两位作者却认为这样解释过于简单，这是一种不动脑筋的视角差错，历史是不可能事先安排好的。作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认为第二帝国的灭亡并非由于共和派革命力量的打击所致，而完全是拿破仑三世的“自杀”政策造成的。如果没有普法战争，第二帝国决不会马上灭亡，因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不是共和与帝制的矛盾，而是帝国政府内部专制派与议会派的矛盾，全国大多数人并不期待共和国。作者以1870年5月的全民投票为证，指出对帝国投赞成票的达735.8万人，投反对票的只有157万人，可见赞成帝国的仍占压倒优势。可是几个月后，帝国却因普法战争中的军事溃败而突然覆亡，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完全是帝国的自杀之举。“自杀论”的提出，无疑为我们分析帝国崩溃的原因拓宽了视野。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黄金时代”中，作者着重分析了这个新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对第三共和国能够“长命”的原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共和国虽然只维护了一部分法国人的利益，却得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拥护，并且维持了七十年之久，这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长期稳定存在，传统的解释是：由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决定。本书作者则认为，如果仅仅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去解释制度的稳定性，显然是不全面的。第三共和国之所以能长期稳定地存在，还必须从意识形态领域里寻找稳定因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纽带问题，认为共和制度能够在法国稳定和巩固，主要应归因于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以世俗化和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第三共和国意识形态，使这个制度有了自己的灵魂。法国资产阶级各个不同派别，城市和农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都与共和制牢固地连接在一起，而这个最重要的连接物正是教育。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注意将爱国主义列为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坚决排除学校中的宗教教育，把共和主义纳入爱国主义之中，以共和信念代替宗教迷信，使爱祖国与爱共和融为一体。这种从小学开始就广泛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共和政体的稳定确实起着某种保证作用。可见，一个国家在巩固政体、稳定社会中，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不容低估。这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当然，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爱国主义，难

免含有民族主义的因素，这一点读者自可鉴别。

在本书第三部分“衰亡”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深入人心的这个共和政体为什么最终又会走向衰亡？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头几年的经济繁荣，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而视之为“黄金时代”的继续，从而忽视了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更不去注意对已遭到损坏的政治体制继续进行改革与更新。革新精神的严重缺乏使过去平衡而稳定的局面难以继续。而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政治”试验的失败，加上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普遍的恐战、厌战，终于导致第三共和国的灭亡。作者在分析共和国灭亡的原因时，提出必须继续进行改革与不断提高民众思想认识，以适应新形势的论点，其寓意是很深的。因为一种政体的长期稳定与巩固，有赖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不断改革和自我完善。

在本书结尾中，作者提出了法国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认为法国需要彻底更新，第三共和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未能逐步建立一个社会共和国。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结论。

总之，阿泽马和维诺克的这部著作，不仅叙述生动、简练，持论比较客观、公允，而且观点新颖，方法独特。只是个别地方尚欠妥贴。例如在论述巴黎公社时，不去引证马克思关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却摘录了作者所需的另一段马克思的话，似乎马克思只承认公社是一次城市起义。此外，对法国的殖民扩张、工人运动几乎没有涉及，对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军、政、金融界的联系亦未论及。诸如此类，毋需赘述，读者自有公论。

本书由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的同志译出。其中前言、第一部分、结束语、大事年表、附录、批评与评论及第三部分结尾由郑德弟翻译；第二部分由沈炼之翻译；第三部分由张忠其翻译。全书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唐祖培教授审订。

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戴成钧、沈坚、吕一民、计翔翔等同志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我受译者委托,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楼 均 信

1991 年 11 月 17 日于杭州大学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诞生(1869—1879)

第一章 帝国母腹中的共和国	3
第二章 社会共和国的第三次失败	29
第三章 共和派执掌共和国	55

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1880—1918)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妥协	82
第二章 思想纽带	106
第三章 考验(1914—1918)	138

第三部分 衰亡(1919—1940)

第一章 共和国陷入困境	154
第二章 坐失良机	177
第三章 不知所措的法兰西	222
第四章 “秩序党”的报复	255
第五章 尾声	292
结束语	306
大事年表	312
附录	

1869 年贝尔维尔纲领	322
全民共和国	325
巴黎公社以后的学校问题	327

饶勒斯关于共和国中的社会主义的看法	328
戴高乐将军告法国人民书(1940年6月18日)	330
魏刚宣言(1940年7月)	331
贝当元帅的演说(1940年7月11日).....	332
参考书目	336
人名索引	342
批评和评论	351

前 言

1940年6、7月间那些阴暗日子给人们留下的记忆，竟使人⁹们没有勇气怀恋第三共和国。实际上，共和国不必等到最终悲剧降临，就该考虑它的代诉人了：且不说存在于共和国始终的一批世代相传的宿敌，只需看看这个制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中信誓扫地的情况以及它在众多的、甚至是赞成共和制的作家中引起的反感就够了：人们开始写道：这个制度已经“腐朽”。维希政府及其文坛对这个已经变为历史陈迹的“破烂货”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我们的一切灾难都起因于它。稍后，从法兰西人民联盟成立起，继而又在1958年，戴高乐派在谴责第四共和国的声浪中又对第三共和国进行了攻击。因此，“第三共和国”这个称号如今听起来，往往被当成一个贬义词：“一个第三共和国时代的人”、“第三共和国的风尚”……这些说法确实使人对它产生怀疑，产生一种陈旧感。于是，这个排行第三的共和国就收到这样一份礼物，那就是使几乎所有人先是一致蔑视它，继而在今天又都对它漠不关心。

然而人们能否想象到，这个共和国也曾有过辉煌时期，而且许多人的心也曾为它而跳动过？第三共和国史上这个美好时期不属于年金收入者和滑稽歌舞剧作者们；它属于那些数不胜数的“真正信仰共和国”的人们（佩居伊语）。因为他们热爱过共和国，为它而¹⁰战斗过；当他们知道共和国有不足时，他们相信它可以改进。正如把教育人民子弟作为自己神圣使命的小学教师一样，共和国激发起来的最慷慨的献身精神往往是无声的、默默无闻的。

不过，我们无意撰写这个共和国的通史，我们只想研究一个政治制度的诞生和灭亡：

在何种条件下，为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共和国最终取代了帝国？

在何种条件下，为何种原因，共和制最后又让位于被称为“法兰西国家”的由一位八旬老人支撑的元首制？

这是我们研究的两个主题。鉴于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结果不同，我们认为不必细述共和国诞生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对事实有意一笔带过，只试图点明通常的看法并引证某些观点。相反，在制度崩溃问题上至今仍很常见的惊人的思想混乱，使我们必须仔细观察最终悲剧降临时接连发生的一切。

最后，这个共和国破例的长命——它延续了七十年^①——使我们想到研究第三个问题：这就是它的寿命问题。在本书中间部分，我们试图对此提供说明。

^① 法国至今共出现过五个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始于1792年，终于1804年；第二共和国始于1848年，终于1852年；第四共和国始于1946年，终于1958年；今天依然存在的第五共和国是根据1958年宪法建立的。——译者

第一部分 诞生

(1869—1879)

第一章 帝国母腹中的共和国

史学家有一种自然倾向，他们认为政治制度的灭亡是必然的¹³ 结果。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在事件发生后撰写其历史时，只需罗列几条万无一失的理由来解释不可避免的结局就够了。可是对事件的同时代人而言，并非一切都如此清楚；何况在政治方面，庸俗的预言家总是占大多数。我们今天来看，第二帝国的崩溃似乎是自身陷入重重矛盾、注定要灭亡的专制政体的蜕化变质所引起的正常结局。这样看待问题可让人不动脑筋，但兴许只是一种视错觉；因为它根本不考虑当时的人们所以对这一结局感到意外的原因，尽管这种结局在我们看来不可避免。

1869年帝国最后的立法选举对其制度似乎是沉重的打击。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社员的P. 格鲁塞在当年12月写道：

“于一夜之间形成的这部帝国机器，如今各个部分正一个零件接一个零件地、慢慢地、无意识地逐步走向瓦解，并已陷入分崩离析之中……^①”

然而，在这个所谓选举灾难之后不到一年，拿破仑三世通过最后一次全民表决，准确地估量出他的顽固的敌视者约一百五十万。H. 贝沙尔写道：“必需像我这样亲眼目睹各党派在全民表决翌日的恐慌，才能了解这七百二十万张赞成票造成的压倒性影响；这对

^① 1869年12月22日《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

帝国不可调和的反对派、不满分子及怀疑者是猝然一击。^①”甚至甘必大也惊呼：“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然而，在这次凯旋式的全民表决后不足四个月，帝国就因军事溃败而复灭。这里，必然性和坏运气究竟各占多大比例呢？不管怎样，就我们讨论的题目而言，首先需要确定，全国大多数人在1870年并不期待共和国。但举足轻重的大城市例外，尤其巴黎，坚决主张共和制。

各派社会力量

大城市和农村的这种政治反差，无疑是普法战争前夕帝制法国最明显、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虽然政治活动在城市“进行”，但法国多数国民还是乡下人；1870年，三千八百万居民中有二千六百万或二千七百万人，即百分之七十居住在乡村。自1848年确立普选制以来，农民选票一直占优势。因此，农民阶层值得重视：正如安德列·西格弗里德所说，在第三共和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仍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市民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时，1936年，受雇于第一部类（农业、林业、渔业）中的法国人与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工作的人数几乎相等。这既表明法国工业化速度缓慢，又表明农村社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过，农村社会从总体上说，曾经是第二帝国最可靠的支柱。

人们常用农民的文盲状态及其政治上的不成熟来解释波拿巴政权为什么在农村受到拥护。其实，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马克思在1852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②中指出，波拿巴代表了“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即小农阶级”；然后解释说，鉴于农民的

① 埃克托尔·贝沙尔(Hector Pessard):《密件》第一卷,第325页。

② 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译者)

相互隔绝,他们构不成一个真正的阶级,而自然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因为这一“行政权力”鉴于其渊源,显得像是农民反对封建主的保护人,随后又像是他们反对城市资产阶级,即反对新封建主的保护人。蒲鲁东在1863年选举后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中表明,尽管工人和农民投了相反的选票,但他们从事过同一个斗争:

“1848年共和国把选举权既赋予了工人,也赋予了农民。然而,当工人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反对政权并和他们一起投票时,在农民看来,皇帝不管有无道理,依然是大革命的胜利和国有财产的拍卖而被肯定下来的土地完全占有权的象征。相反,国王——无论他是资产阶级的保护人还是绅士阶级的君主——在农民看来从来都是封建权益的标志;此种封建权益,在农民多疑的目光中,如今又体现在资本家、工业巨头、公司经营、批发商、文人或法官身上……^①” 16

因此,拿破仑三世被看成是乡下人“反对资产阶级封建制”的保护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蒲鲁东不谋而合。此外,第二帝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从总体上说对农民是有利的,尽管这一论断在细节上还需加以区别^②。绝大部分多少占有土地的农民,都从土地涨价中得到了好处;都市化、铁路网的建立以及边界开放开始使古老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农村居民大批外流、减轻了(农村的)人口压力。七月王朝末年和第二共和国时期饱受危机之苦的农民,此时感到境遇明显改善;正如蒲鲁东所说,他们“不争论其缘由……;这些好处是在帝国时代得到的,为此他们感谢皇帝”。因此,仅仅用常被提到的农民害怕“均分财产主义者”这一理由,不足以阐明农民对皇帝的忠诚。总之,不管对拿破仑的传说有何影响,农民对皇帝的忠诚,与其说是他们对一个王朝的依 17

① 《论工人阶级的才能》第68—69页。

② 农民不是一个整体:大地主从帝国繁荣中得到的好处远比小佃农或农业工人要多。贫困仍是常见现象。我们在此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帝国时期法国的社会状况及其经济形势。

恋,不如说他们认为这是捍卫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农民忠于1789年革命,不信任“达官贵人”和“领主老爷”,在很多省份他们也不相信昔日征收什一税的教士;他们对城市自由派,即不属于他们天地的共和派或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同样疑心重重,于是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帝国。重新获得农村支持看来是共和派首要任务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共和派曾把某些农村地区拉到自己一边,但太浮于表面,以至无法抗衡马克思所称的“农民宗教”这一拿破仑幻影。

面对这个人数最多、最忠诚的农民法国,皇帝必须考虑城市和工业的法国。正是在后一种法国中,皇帝遭到了怀疑:无论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还是工业无产阶级都不信任皇帝。第二帝国曾是十九世纪法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决定性阶段。法国不仅进入了不以皇帝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发展阶段,而且在拿破仑三世时期还涌现出一批对进步满怀信心的起领导作用的人物;这给帝国带来了唯利是图的一面以及它的现代特色。路易一拿破仑并不擅长经济,然而他的游历、尤其是他旅居英国的岁月,他的阅读以及圣西门学派中某些人士——如米歇尔·舍瓦利埃和佩雷尔兄弟——对他的影响,使他懂得现代社会必须扩展经济,国家在这一领域不应持消极态度。此外,他还有某些微弱的社会追求,他想把民众阶层笼络到

18 自己一边:经济发展或许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一部分被迫接受政变的资产阶级很快从这个强有力的政权中得到了好处。信任感的恢复、世界市场上黄金的大量涌现以及众所周知的尤其在信贷和交通运输业中的革新,使帝国进入了全面繁荣;生产总值证明了这一点。大资产阶级从这一发展中捞到了实惠。例如,国家通过1859年协议,为铁路公司、因此也就为其股东保留了巨额利润。经济发展促进了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发展。1847年,巴黎有165 000个“老板”,1870年则只剩下不足40 000个。1857年,十一家特许公司共同分享铁路网;1850年,此类公司

约有四十家。据蒲鲁东的合作者 G. 迪歇纳统计：“银行、信用社、大型客轮、铁路、大工厂、大冶炼业、煤气，举凡稍有规模的公司，统统集中于 183 人之手^①。”随着大商店的创建，商业也出现了集中。更为可观的现象是某些大冶炼厂的出现，如克勒佐的施耐德冶炼厂，该厂拥有 10 000 名工人，居全行业之首。不过，这些数字不应使人产生错觉。除了像佩雷尔、达拉波、博西哥、施耐德等这些大胆果断的真正的工业巨头外，法国资产阶级中还有数以千计的“梯也尔先生”，他们是谨小慎微的经纪人，他们占有土地，因循守旧。为了让资产阶级摆脱贸易保护主义，拿破仑三世只得强迫他们，因为他们陷于眼前利益而不能自拔。1860 年，拿破仑三世犹如宪法¹⁹允许的那样，越过立法团和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签订了通商务约。此举激怒了法国大多数资产者。纺纱厂主布伊埃—凯蒂埃是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梯也尔不久也站到了凯蒂埃一边。和英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以及随后与西欧其它国家签订的条约，使第二帝国期间法国出口总量增长了四倍。这有什么关系：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照样不宽恕 1860 年的“关税政变”，并始终为恢复关税保护而斗争。小资产阶级注重节制和平衡，厌恶冒险，追求切实可靠的利益，它始终蛰伏于法国资产者队伍之中：法国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贫穷的资本主义，它总有一点乡村商行气息。

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在工业和大宗买卖方面表现无能的原因，人们已有很多论述^②。我们暂且只指出这种无能：它说明了帝国经济政策相对失败的原因。从 1860 年起，统治阶级又讨好反对派。往日的奥尔良派和感到失望的波拿巴主义者在政治上鼓吹新的自由主义，以对抗皇帝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以主张传统主义的

① 转引自 G. 迪沃 (G. Duveau)：《法兰西人民史》第四卷，第 187 页。

② G. 迪沃在前引书第 217 页说：“资产者远不是生产者的同义词，它趋于变成食利者的同义词。”不过，正如 R. 卡梅龙在《法国和 1800—1914 年间欧洲经济的发展》中所指出的，法国在十九世纪并不缺乏承包人。

罗特希尔德银行和布伊埃—凯蒂埃制造厂为一方，以佩雷尔兄弟为代表的信奉圣西门主义的产业资产阶级为另一方所展开的斗争中，前者最终败北。从此，反对派便以自由主义为虎皮，其保守思想仍很明显，但这毫不妨碍茹尔·西蒙、厄内斯特·皮卡尔和茹尔·法夫尔一流共和派与“自由之友”进行联合。在1863年选举中，由奥尔良派和温和共和派组成的“自由联盟”开始问世，这是帝国第一个真正的议会反对派。然而，一般说来，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显贵，都不希望制度倾复：因为共和国令他们恐惧，而王朝复辟似乎又不可能实现。

中小资产阶级显然是更激烈的反对派。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说来还不高的国家里，不以工资为生的中产阶层举足轻重。数不胜数的法律界人士：律师、诉讼代理人、公证人、执达员，以及医务界（当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特殊地位）、商业界和新闻界人士构成了反对派核心；从他们中间才能了解反对派的心声。小资产阶级对经济形势并不感到特别满意。他们不时成为集中的牺牲品，深受周期性危机之苦，因而对帝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怨艾。由于传统的原因，他们是特别容易接受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的阶层。专制帝国对中小资产者毫无吸引力，它常常妨碍他们生计；而“被律师和新闻记者视为乐土的代议制”（H. 贝沙尔语）却深受他们喜爱。除这些骨子里反对帝国的社会集团外，还需加上年青一代，特别是在校青年，帝国从未赢得过他们的好感，拉丁区^①是反对派的圣地之一。从帝国初年起，这里就有许多时隐时现的激烈的出版物；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发生反对帝制的示威游行。此外：

- 21 “年青一代十分活跃，他们人数众多，希望在社会上谋取一席之地。他们强烈依恋共和主义思想，绝不甘心向帝制屈服。他们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痛感自己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而无法获得任何职务。他们要

① 拉丁区是巴黎文化区，法国许多著名学府皆在此地。——译者

向帝国发起攻击，而且不仅停留在提出抽象的思想和含混的愿望，还要付诸实力①。”

因此，巴黎有一个成份复杂的由大学生、年轻职员和多少失去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的都市阶层，即通常受布朗基思想影响的整个小资产阶级：这些人不同程度地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很难、或者没有被纳入都市社会之中；而正是在这个难以确定其社会属性、但又具有典型巴黎色彩的阶层中，人们可以看到最强烈的政治激情。拉乌尔·里果、茹尔·瓦莱斯是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这些集团应该与工人阶级区别开来。

工人阶级（蒲鲁东说到这个词时，用的是复数）尚未形成统一的整体，它的集中程度还有限。单独谋生或被雇于某个小工场的手工业者，仍是巴黎最常见的工人类型。有人估计，大企业中的工人、即“准确涵义上的无产阶级②”，当时只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十。所以，帝国时代的工业化不应使人产生错觉：法国依然是小企业的国家。G. 迪沃继西米昂之后指出：从1846年至1871年，法国工人数量整体上基本保持不变。巴黎地区显然因奥斯曼工程的缘故，工人数量才略有增加，1870年达到约四十四万。

关于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处境，史学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²²为，鉴于物价上涨高于工资上涨，工人处境无可争辩地恶化了；另一些人则认为工人生活有所改善，证据是他们的食品质量有了提高（面包用量减少，肉类用量增加等等）。正如通常情况下一样，这些不同的判断常常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依据的素材各不相同；而且，“工人处境”这一表述法没有区分差异很大的地区和行业间的实际情况。关于工人的工资，传统说法是，帝国时期，工人“名义工

① 见吉罗多(Giraudeau)：《青年与公职》；切尔诺夫(Tchernoff)在《政变和第二帝国时期的共和党》第389页引用过这段话。

② H. 勒费弗尔(H. Lefebvre)：《公社的成立》第73页。